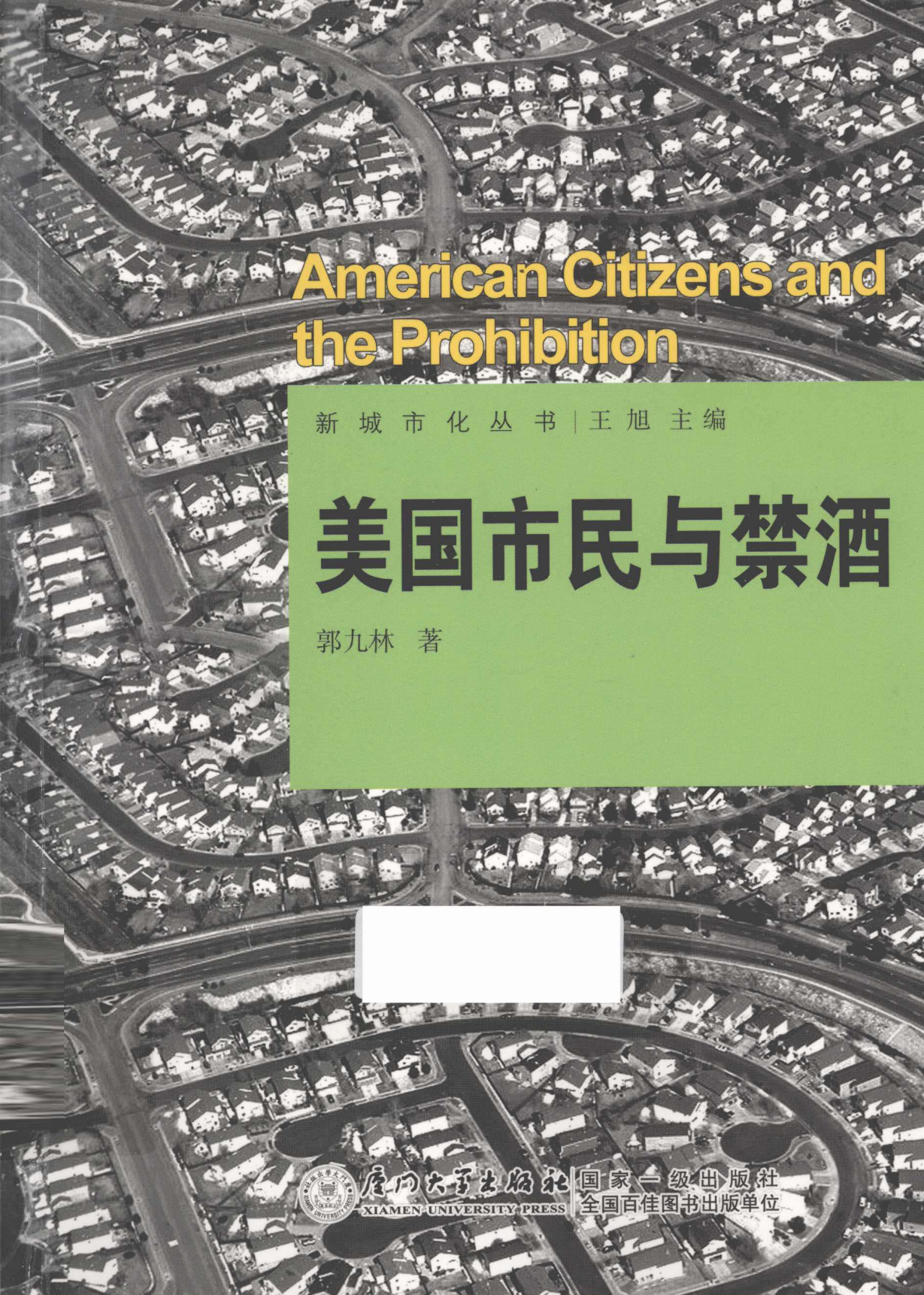




American Citizens and the Prohibition

新城市化丛书 | 王旭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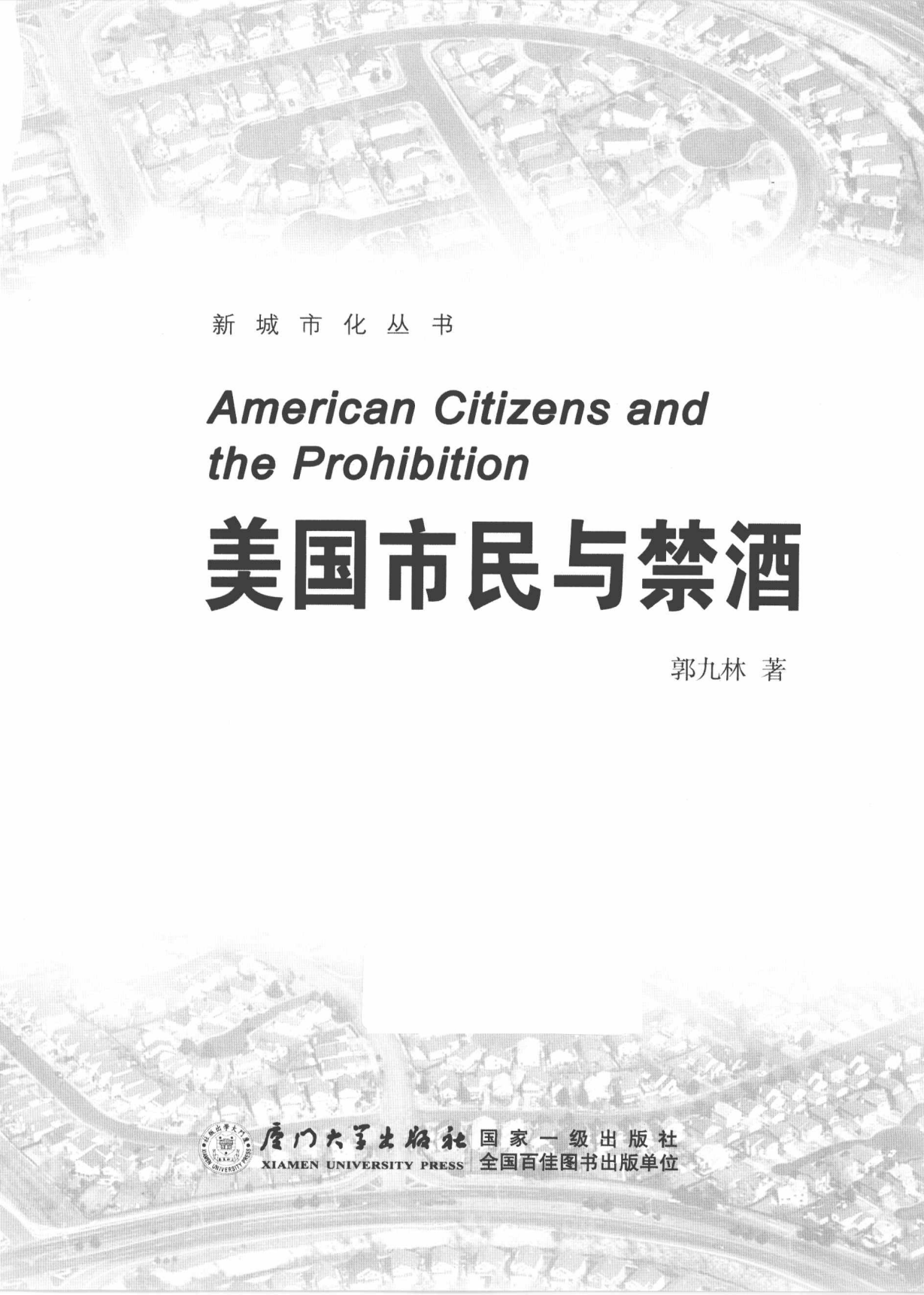
美国市民与禁酒

郭九林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新 城 市 化 丛 书

*American Citizens and
the Prohibition*

美国市民与禁酒

郭九林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市民与禁酒/郭九林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新城市化丛书/王旭主编)

ISBN 978-7-5615-4183-8

I. ①美… II. ①郭… III. ①社会问题-研究-美国 IV. ①D77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0582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970 1/16 印张:17.5 插页:2

字数:296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丛书总序

王旭

城市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中重大历史现象,有其规律可循。自20世纪初至今,世界各国相继向一个有别于“传统城市化”的阶段加速迈进,我们把这个崭新的时期称为“新城市化”阶段。

所谓“传统城市化”,大致相当于城市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其主要特征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由小到大,逐级递进;城市周边地区发展迟缓,郊区完全处于依附地位,是城市化的预留空间;由于郊区发展滞后,因此城市的空间布局以单核或单中心为主。

所谓“新城市化”,与“传统城市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一,在这个阶段,人口和经济活动开始出现相对分散化的趋势,郊区或城市外围地区逐渐反客为主,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主导力量;第二,中心城市与郊区经济重新定位,功能互有置换。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依然存在,但在区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制造业、零售业等在郊区获得广泛的发展空间;第三,在郊区普遍兴起的城镇中,出现一些经济独立性很强的次中心,与原有的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复中心或多中心结构,优化了区域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结果,城市与郊区从此消彼长的博弈到同步依存,进而形成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新的地域实体(一般称大都市区)。这标志着,城乡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良性互动,城市化从单纯的人口转移型向结构转换型过渡,进入高级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城市与区域规划、市民社会和社会群体关系、地方政治和政府政策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是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这既是“传统城市化”的成熟期或称鼎盛时期,也是城市发展的困难期:有限的城市空间开始出现饱和和现象,“城市病”凸显,如城市住宅紧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社会治安等问题层出不穷,无形中增加了城市发展的额外成本,城市的规模成本逐渐大于规模效益,聚集经济变成了聚集不经济。相形之下,郊区开阔的空间和宜居环境、公共交通的改善、私家车的普及等,比较优势凸显,城市和郊区之间“推力”和“拉力”此消彼长。故此,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城市化”的过渡是城市经济社

会等方面结构性变化的必然结果。

世界各国城市化起点不一,发展速度各异,但在 20 世纪初,一些经济较发达国家城市相继进入新城市化的起步阶段,20 世纪中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地位最重要的首推美国。1920 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初步实现了城市化,其后,人口和经济活动开始大规模向郊区扩展。到 1940 年,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将近一半,美国成为一个大都市区国家;到 1990 年,百万人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有 40 个,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一半,美国又成为一个以大型大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相比较而言,欧洲国家的新城市化进程则因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有较大的起伏,二战后方走上快车道;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是在二战后;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紧随其后;拉美国家由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过渡,发展速度与其他经济较发达国家一致,只是裹挟了很多传统城市化时期积压的社会问题。

在这些先行一步的国家,城市和周边地区,实际上已无清楚界限可言,两者之间的界定也越来越模糊,“城”、“乡”这两个传统的地域概念已不能准确概括新的人口分布趋向了,因此很多国家出台新的概念。在英国,类似的城市化区域被定名为“大都市郡”和“大都市区”,法国为“城市化区域”,德国为“城市区域”或“都市化地区”,澳大利亚为“统计大区”,加拿大为“人口统计大都市区”,日本为“都市圈”。这些概念,尽管标准略有不同,但对其空间结构的认识是统一的,都包括核心区和边缘区两部分,或称中心城市和郊区县域,而且,都是以城市的实际影响范围即功能区域为依据,不受行政区划的局限。美国自 2000 年起,就已经不再使用城市和乡村的概念进行人口统计,取而代之的是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区。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城市,抑或大都市区,已经不仅仅是概念问题,而成为某种思维定式。

显然,在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发展确实可以、而且有必要分为前后衔接但又各具特色的两大阶段,这是世界城市空间结构的总体发展规律,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或迟或早地会经历这两个阶段,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目前城市发展迅猛,即将全面跨入新城市化门槛,在这个关键时期,迫切需要从其他先行一步的国家寻求借鉴,深入准确地认识新城市化时期城市的发展规律,打破传统城市化阶段形成的城乡差别和行政区划的束缚,争取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新城市化势必带来一系列重大而快速的变化,我们要有理论研究方面的前瞻性准备。

遗憾的是,尽管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研究几成“显学”,但城市化基本理论方面没有重大建树,对上述新地域实体的认识也沿袭传统城市化的思路,有“城市圈”、“城市群”、“城市联盟”、“城市综合体”、“集合城市”等十几种称呼,倚重城市,未能准确反映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真谛。事实上,城市和郊区已高度融合,构成大都市区不可分割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宜厚此薄彼。也有些学者过分强调郊区横向蔓延的消极后果,把多中心与横向蔓延画等号,将其简单归结为“逆城市化”或“摊大饼”现象,认为其不符合中国国情和目前城市发展阶段的需要。我们不必讳言,国外新城市化过程中也有很多负面问题,如地域蔓延过度、经济成本过高、居住区隔离、地方政治零碎化等问题,这些负面问题在美国尤为突出。但这些问题有其特定原因,多半是新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过渡性现象,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以此否定城市发展的总体趋势。在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影响根深蒂固、城乡差异有增无减(甚至出现“欧美城市、非洲农村”的尴尬局面)的情况下,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更有不可替代的学理意义和实践意义。

总之,我们需要使用 21 世纪的理论解读 21 世纪的城市。传统的城市化理论指标单一,过于强调人口的集中和城市数量及自身规模的扩大,适用于阐释从城市发展的初期到中期的基本规律和问题,对于城市发展高级阶段的很多问题无法解读,更难以为我国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持,需要修正。修正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从新城市化的宏观视角切入,统筹考虑城市与郊区,而不是因循传统城市化的思路,将注意力仅仅局限在城市本身,以城市这个带有“封闭性”的地域行政单位来应对目前已经高度一体化的区域问题。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就是我们在新城市化方面的系列性研究成果。自 2006 年起,我们相继完成了《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美国城市经纬》、《美国高科技城市研究》3 部著作(均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新城市化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现在,我们所撰写的这套丛书,共 8 部独立成篇的专著,进一步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市民社会与城市公共空间、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城市公共住房政策、市民与城市社会运动等方面进行系统深入地解读,从不同层面认识新城市化的某些典型特征。这套“新城市化”丛书,是跟踪学术前沿、理论创新的一次尝试,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同仁的关注和认同。

目 录

第一章 禁酒运动概述	1
一、禁酒运动的历史回顾	2
二、禁酒运动的特点	9
三、学术史回顾	13
四、研究方法思路	26
第二章 社会福音运动与禁酒的缘起	37
一、社会福音运动与禁酒	37
二、社会福音教派的禁酒实践	47
三、社会福音教派禁酒实践的特点	57
第三章 市民健康意识的觉醒与工人的禁酒动机	65
一、市民对饮酒危害性的科学认识	65
二、社会改革者的禁酒主张及实践	76
三、企业主的禁酒动因和实践	81
四、工会组织的禁酒之争	88
第四章 酒文化、酒馆与城市问题	102
一、殖民地时期的饮酒文化	102
二、早期酒馆的社会功能	105
三、城市酒馆的兴起	108
四、进步运动时期的酒馆与城市问题	113
第五章 城市禁酒问题的政治角斗场	129
一、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的禁酒实践	130

二、两党的禁酒态度	136
三、反对酒馆联盟与禁酒的再次兴起	144
四、ASL 的实用主义禁酒策略	148
第六章 “神圣试验”与无序的城市	159
一、ASL 与禁酒立法的出台	159
二、美国禁酒局与 ASL 的禁酒实践	169
三、禁酒执法及其效果	175
四、反对禁酒立法的社会呼声	193
第七章 现代都市文化与禁酒的困境	200
一、政治气候的转变与对禁酒的质疑	200
二、都市文化的兴起与女性饮酒的流行	208
三、酒吧中的女权主义与男性饮酒文化没落	219
四、妇女禁酒阵营的瓦解	223
第八章 城市大选与“神圣实验”的终结	230
一、废禁问题的政治化与 1928 年大选	230
二、萨宾与全国禁酒改革妇女协会的反禁酒措施	235
三、罗斯福与《第 21 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	241
结 论	254
缩写术语英汉对照表	259
图目录	261
参考文献	262
一、英文参考文献	262
二、中文参考书目	270
三、相关因特网网址	273

第一章 禁酒运动概述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社会转型。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和西部大开发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内战后,美国迎来了一次大的移民潮和国内大迁移。南方黑人人口向北方和城市地区迁移,同时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东部沿海大城市,并逐级向腹地城市推进,城市人口剧增,城市空间规模急剧膨胀。“美国由农村搬入城市”,城市发展模式由传统城市向新城市嬗变。到了 1920 年,美国 1 亿人口中已有一半人居住在城市,美国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①

随着城市的大规模兴起,新的城市问题也随之而来。市政体制的不完善和联邦政府放任自由的宽松政策给了“城市老板”掌控城市经济命脉的实权,他们与各大企业沆瀣一气,互相利用,腐败之风充斥市政管理,市政建设出现严重无政府状态,与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极不和谐。面对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道德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城市居民在经历了苦闷彷徨和心理不适之后,他们不断调整心态,积极迎接挑战,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改善城市生态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在这半个世纪里,美国社会矛盾丛生,社会运动不断。以三 K 党为首的本土主义运动、工人工会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妇女参政运动、城市社区改良运动、禁酒运动等此起彼伏。作为公共空间的城市既成为美国人上演各种社会运动“大戏”的舞台,又是他们整饬和改革的对象。公共空间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城市生活,公共空间里的社会

^① 1910 年,美国预算总署(Bureau of the Budget)在其人口统计中第一次使用了“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s)的概念。1920 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51.2%,被认为已成为城市化国家。这一年,美国大都市区有 58 个,其人口占总人口的 33.9%。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可将 1920 年看作美国城市化发展史的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一边,是以商业城市发展为主的传统城市化模式;在另一边,是以工业城市发展为主的大都市区化,称为“新城市化模式”。关于美国城市发展模式,可参见中国美国城市史研究著名学者王旭教授的专著《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4~309 页。

关系、政治文化因此也成为了解市民社会的重要途径。^①

公共空间的禁酒之争成为这一时期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各类社会改良运动中最具代表性。与其他社会运动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相比,美国的禁酒运动十分特殊,它见证了美国社会大转型的整个过程,成为考察城市空间内各阶层利益相磨相荡的重要运动。无论从时间的长短、规模的大小,还是从造成的社会影响来看,其在人类历史上尚属罕见。可以说,禁酒运动是美国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是美国各阶层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调整心理落差、重新寻求社会定位的一次尝试。禁酒运动是一面多棱镜,它折射出了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十分广泛,触及当时美国的政治文化、道德环境、经济状况、宗教纠纷、种族冲突、妇女地位、市民心态等诸多问题。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也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和民主思想的基础。一部美利坚的历史就是一部追求民主、个人自由与幸福的历史。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视自由、个人权利为根本的国家,美国国会居然能够通过一部强硬的全国性禁酒法令,以法律的手段限制和规范个人生活习惯和行为自由,这件事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事实上,禁酒运动并不像表面上不让人们喝酒那么简单,它从深层次折射了自19世纪以来美国社会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美国社会各阶层为了追求理想、保护本阶层利益、维护社会正义和捍卫美国民主制度,把禁酒看成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最佳途径。

作者试图以美国城市为面,以禁酒运动为线,历史性地考察美国城市中的不同群体在经历社会大转型、面对社会经济生活巨变时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心态。禁酒运动研究的意义在于以小视大,认识和发现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生态当中错综复杂的群体利益关系和城市文化现象,揭示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禁酒运动的历史回顾

禁酒运动(Prohibition Movement)最早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历时一个多世纪。全国范围的强制性立法禁酒始于1919年,标志是《第18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禁酒结束于1933年,历时13

^① 杨长云:《美国新城市嬗变中的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厦门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页。

年。运动的高潮发生在 20 世纪初期,即进步运动的大背景之下。美国的工业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的速度,美国进入社会大变革时代。城市的发展孕育了都市文化,酒馆业兴起,酒馆文化盛极一时。酒馆的蔓延也同时滋生了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因此也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进步人士开始强烈呼吁禁酒,理由主要有以下五点:(1)饮酒对饮酒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2)基督教教会认为饮酒不仅摧毁了人对上帝的敬拜,还摧毁了个人的自律意志和维护社会道德的良好愿望,有悖于基督教教义,是个人自救和千禧年降临人间的最大障碍;(3)酒馆滋生了政治腐败,城市犯罪率上升,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受到严重腐蚀;(4)酗酒引发了家庭暴力和贫困,酗酒男人的挥霍和暴力行为使妇女儿童成为直接受害者,美国家庭和谐受到威胁;(5)酗酒让工人失去理智和劳动能力,工伤事故增加,工厂劳工保险费用增加,生产效率严重受损,企业不堪重负。

严格地讲,整个美国的禁酒运动包含戒酒、禁酒和废禁三个大的阶段。内战之前很多地区只是倡导戒酒,故应当称之为“戒酒运动”(Temperance Movement)。内战之后一些州和城市、村镇开始呼吁用强硬的法律手段阻止人们喝酒,这才真正称得上是禁酒运动。1919 年之后到 1933 年是禁酒运动的衰落阶段,实际上属于废除禁酒立法时期,当称之为“废禁运动”(Anti-prohibition Movement),是禁酒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性质上看,禁酒强调用法律手段限制人们喝酒,而戒酒则强调通过道德的力量说服人们放弃饮酒恶习,净化社会环境。

独立革命至美国内战这段时间是禁酒运动的初级阶段,也是形成阶段。殖民地时期,饮酒并没有给殖民地的社会治安带来威胁,酒并没有被认为是邪恶的东西而加以禁止。相反,酒在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中用途十分广泛。殖民地人民认为酒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同时,宗教界还把它看做上帝赐予人们的礼物,是“上帝的灵物”(Creature of God)。虽然清教牧师们一直主张过勤俭朴素的生活,但在殖民地时期,只要人们饮而不醉,那么饮酒就没有什么错。即使醉了,也只不过被看成是一种无节制的不道德行为,并不会被认为会滋生社会问题。在当时,人们对酗酒的社会危害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加上殖民地时期的娱乐活动极其贫乏,对男士来说,饮酒是一种难得的放松方式,酒馆因此成为殖民地男人们纵情欢乐与交际的最好场所;更为重要的是,酿酒业在殖民地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殖民地的经济主要依靠进口糖浆生产酒类。由于当时交通不畅,西部生产的谷物不便运输,于是就地酿成威士忌酒,体积变小,利

润增高,酿酒和售酒理所当然地成为西部农民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独立后,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酿酒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酒对社会的危害性也逐渐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美国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酒类消费随之明显增加,酗酒和醉酒对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开始从健康和道德的角度,向居民们宣传酗酒对人体和社会秩序造成的危害。早在 1785 年,外科医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就出版了《烈酒对人体以及社会幸福之影响的调查》的小册子,对酗酒的危害性给予强烈的谴责,成为当时最具销量的出版物之一。不过,即使到了 18 世纪末,反对酗酒的呼声也十分微弱,戒酒组织规模很小,而且十分分散。19 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冲突不断,矛盾重重。有识之士倡导社会改革,创建理想、公平的社会,于是各类改革运动应运而生,其中既有要求改良社会制度的废奴运动、女权运动、普及公共教育运动,也有要求改善个人道德与信仰的宗教运动。在这个大背景下,区域性的戒酒运动随之发展起来。

18 世纪 90 年代末至 19 世纪 40 年代,美国掀起了一场社会福音运动。社会福音教派,如浸信会、长老派教会、卫理公会等,强烈反对正统基督教所宣扬的预定论。它强调真善论,认为所有人的灵魂均可以得到救赎,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这场宗教运动在本质上就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社会福音教派通过布道的方式,向人们宣扬宗教和社会改良思想。与其他教派相比,福音派教会更关心世俗的事情。牧师们号召教徒关注社会问题,通过社会慈善活动净化自己。他们对饮酒、教育、妇女和奴隶制度等社会问题十分关注,并成立了各类协会,从事社会改良活动。对于饮酒问题,福音派新教徒宣称,圣灵不会拯救沉湎于酒精的酒鬼。他们指责说,正因为酒类零售商向人们出售威士忌酒,安息日的规矩从而破坏,男士们才丧失了赡养家人的能力。在他们看来,反对酗酒就是铲除邪恶、维护正义,帮助酗酒者得到拯救。最早的戒酒组织大多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例如,1812 年成立的马萨诸塞制止酗酒协会(MSSI),1826 年新教代表还成立了美国戒酒协会。

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又有很多的戒酒协会相继成立。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新成立的戒酒协会已经走出了狭窄的宗教范围,开始参与戒酒活动。一些制造业者和工业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严格劳动纪律,开始积极支持禁酒。其他非教会人士也积极参与到了反对酗酒的活动当中来,他们在各类戒酒组织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影响力开始扩大。可以肯定,社会福音运动积极地推动了戒酒运动的兴起。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福音派新教徒依然倡导和支持戒

酒,但戒酒运动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独立于教会之外的戒酒协会逐渐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19世纪40年代的“华盛顿人运动”就是一个独立于教会之外、第一个最有影响的戒酒协会,它的出现让戒酒运动的规模急剧扩大。

内战以后,戒酒运动逐渐转变成禁酒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其标志是《第18条宪法修正案》和《沃尔斯特德法案》(Volstead Act)的出台。这是禁酒运动的第二个阶段。美国内战以北方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胜利而告终。此后,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经济的繁荣和科技的进步使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大幅度增加,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50%。^① 粮食产量除了满足全国人口需要的同时,还有大量的剩余,为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内战后的20年间,酿酒业的投资增加了700%。^② 酒类产量的提高极大地刺激了酒类消费,酒馆数量倍增。比如,西部小城弗吉尼亚城人口仅有1万,而酒馆却超过500多家,酗酒的人数比以前明显增多。^③ 无论是西部边陲小镇,还是东部的大都市,到酒馆饮酒成为一种时尚。因此,城市中的酗酒人数逐年增加,每年因酗酒醉酒而死亡的人数达4000多人。^④

这一时期,美国工业化速度加快,工厂制度开始确立。工业化促动了城市化,大城市不断涌现,城市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城市中的移民人口猛增。1860—1900年,共有1400万移民移居美国。^⑤ 城市化的速度远远快于社会结构调整的速度,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规模扩大,空间不断蔓延,住房日益紧张,居住环境越来越差,城市犯罪率上升。面对诸多城市问题,人们的困惑和不满开始显现。同时,这一时期的移民大多数都来自东南欧和罗马天主教地区,这些天主教徒和非福音派新教徒都不主张禁酒。对于这些漂泊他乡的移民来说,到酒馆饮酒成为怀念故土和释放紧张情绪的一种方式。酒馆和移民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城市白人把外来移民和他们的文化看成是对美国本土文化的挑战和威胁,仇外心理日渐强烈。因此,白人主流社会反对移民到酒馆酗酒的呼声日益高涨。

① 陆镜生等著:《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90页。

② Arthur S. Lind, *American Epoch,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73, pp. 20~26.

③ 贝阿德·斯蒂尔著:《美国西部开发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

④ Barbra Leslie Epstein, *The Politics of Domesticity: Women, Evangelism and Temperance in Nineteenth America*, New York: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01~113.

⑤ 陆镜生等著:《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290页。

工业化时期,“城市老板”操纵地方政府,飞扬跋扈,酒业集团与腐败政客沆瀣一气,挥霍无度,政府官员腐败严重,政治民主受到严重践踏,城市居民生活条件糟糕,改革的呼声十分高涨。与此同时,酒馆滋生了各类社会问题:酗酒者在酒馆滋生事端的事情时有发生;酒馆里的卖淫嫖娼活动开始猖獗,导致性病流行;儿童和未成年人饮酒者人数增加;酒后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的现象成为家常便饭,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干扰。1875年轰动全国的威士忌酒操纵集团丑闻使饮酒问题成为千夫所指的焦点。^①这一集团中的酿酒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官员营私舞弊,私吞联邦酒类消费税收达数百万美元。公众对酒业利益集团的愤慨如山洪般爆发,城市酒馆被视为一切社会罪恶的源头,被看成是对美国民主政治、纯净生活和社会安宁的巨大挑衅。以中产阶级妇女为核心的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此后简称WCTU)和反对酒馆联盟(Anti-Saloon League,此后简称ASL)的禁酒改革者挺身而出,主张铲除酒馆,反对酒精放纵,呼吁政府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这一时期禁酒运动之所以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源于全国酒类消费量的激增,饮酒者人数急剧膨胀,饮酒给社会环境造成巨大威胁;其次是由于社会弊端丛生,改良社会的进步主义思想流行起来,各类社会改革运动风起云涌,进步主义运动的社会大潮给禁酒运动提供了契机,成为推动禁酒运动的直接动力。

从1919年全国实施禁酒到1933年《第21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是禁酒运动的第三个阶段,也是禁酒运动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又可称之为“反禁酒时期”。反禁酒运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反禁酒修正案协会(The Association Against the Prohibition Amendment,此后简称为AAPA)

^① 格兰特总统在位时期(1869—1877)是美国历史上腐败程度较高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发生了两起重大丑闻,即信贷公司丑闻和威士忌酒操纵案。威士忌酒操纵案是指税务官员、酿酒者与商贩勾结起来,共同偷税高达数百万美元的事件,案件牵扯到了财政部的主要官员和格兰特的私人秘书。1881年就职不久的加费尔德总统即被一名求职未遂者枪杀,这件事凸显了政党分肥制的积弊之深。加费尔德的死促使公众开始关注腐败问题,推动了文官制度改革。腐败不仅在联邦政府中盛行,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中更为盛行。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政党机器特别是地方党魁操纵着城市政府甚至州政府,他们靠收买城市贫民选票控制政府,利用政府合同收取回扣,利用政府职位酬劳党羽,政府成为核心小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费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巴尔的摩等城市都曾沦为党魁操纵的工具,坦慕尼厅成为腐败的城市政府的代号。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前期。

成立前的反禁酒运动。这一时期反对禁酒的主力是与酒类生产销售相关的企业家、酿酒工人和酒馆及酒吧的服务人员,他们都带有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色彩,正因如此,反禁酒者的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第二阶段是反禁酒运动扩充实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反禁酒修正案协会成立,并且成为反禁酒运动的领导核心。这一时期反禁酒运动比较温和与保守,反禁酒者的具体目标是废除各州禁酒执行法和修改《沃尔斯特德法案》(Volstead Act),争取含酒量为2.75%的啤酒生产合法化。1923年纽约州废除了州禁酒执行法,反禁酒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对于修改《沃尔斯特德法案》,尽管反禁酒者在1924年和1926年两次国会听证会上作出努力,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三阶段是反禁酒运动的高潮阶段。1928年总统竞选,反禁酒者支持同情反禁酒的民主党候选人——纽约州州长阿尔·史密斯(Al Smith)。尽管最终史密斯落选,但是这一竞选使两大政党在禁酒与反禁酒上有了明显分歧,为1932年大选民主党成为一个支持反禁酒的党创造了条件。第四个阶段是作为史密斯的后继者保利娜·萨宾(Pauline Sabin)领导的全国禁酒改革妇女组织(Women's Organization for National Prohibition Reform,此后简称为WONPR)。在废禁问题上,她迫使政客们在“干”、“湿”之间作出选择。她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采取了新的策略,将废禁运动纳入政治轨道,借助政治力量实现解禁。

严格地说,支持禁酒的“干派”和反对禁酒的“湿派”^①之间的斗争几乎从禁酒运动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当初福音派新教徒主张戒酒时,天主教、犹太教及非福音派新教徒就反对戒酒。内战结束后,酿酒商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反对禁酒活动。1867年全国酿酒商大会发布宣言,声称反对任何同情禁酒的公职候选人。1917年禁酒法案通过后,遭到有组织劳工的强烈反对,《禁酒法》的实施遇到了强烈的抵制。但是这些反对和抵制活动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1919年《禁酒法案》生效,酒馆被取缔,饮酒者正常买酒的渠道被堵死。于是“地下酒馆”(speakeasy,又称斯比克)遍地开花,一本万利的酒类走私开始走俏,但酒水的质量之差令人忧虑。进入20年代,美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新行业层出不穷,就业机会增多,现代都市文化骤然兴起,娱乐和消费时代到来。饮酒者人数骤然增加,儿童、妇女加入到饮酒者的行列,劣质酒唾手

① 美国将支持禁酒的州称之为“干州”(the dry states),反对禁酒的州为“湿州”(the wet states),因此,相应地将禁酒派称之为“干派”(the dry),反对者为“湿派”(the wet)。本书很多地方用到了上述概念。

可得,酒禁而不止。同时禁酒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执法犯法,禁酒立法形同虚设,法律的威严受到挑衅。现代都市文化和女权思想对美国的妇女产生了巨大影响,激进的年轻大学生和职业女性开始挑战传统,她们把饮酒看成是女性独立和时尚的表现。男人的领地——酒馆被关闭了,地下酒馆成了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娱乐、放松的好去处。随着女性饮酒人数的增多,酒类饮品走进千家万户,饮酒的家庭化趋势明显加大。禁酒妇女阵营开始瓦解。

禁酒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反禁酒组织的数量增多,声势和力量增大。“湿派”一开始只希望修改禁酒立法,解除严格的0.5%酒精含量的限制,进而转变成一场废除《禁酒修正案》的反禁酒运动。美国酿酒商协会到各州活动,阻止修正案在各州获得通过。反对禁酒修正案协会从政府构建原则的角度批判了修正案的合理性,认为禁酒实践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从而剥夺了《宪法》赋予州和地方的那部分权力,是对联邦主义的践踏。全国酒馆协会在律师的支持下,也开始挑战禁酒立法。他们认为,《第18条宪法修正案》与美国宪法精神相违背,与《宪法》前10条修正案所保证的公民自由和州权力相矛盾。反对禁酒修正案协会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还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以寻找反禁酒的证据。他们出版了许多小册子,成功地改变了大众的立场,反禁酒势力进一步加强。1928年,美国律师自愿委员会成立,1929年又成立了美国妇女禁酒改革组织。在最后一阶段,即反禁酒运动赢得胜利的阶段,反禁酒者的努力主要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争取在1932年大选中赢得两大政党的支持。只要民主党支持反禁酒,他们就极力支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罗斯福。第二步,在罗斯福成功当选后,反禁酒者借民众广泛支持废禁的东风,要求各州议会支持并通过《第21条宪法修正案》,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措。

1928年的总统大选成了废禁运动的转折点。支持废禁的民主党领导人阿尔·史密斯虽然没能成功问鼎白宫,但他将禁酒问题政治化,让民主、共和两大党在禁酒问题上作出明确的立场选择。在此基础上,全国禁酒改革妇女协会打破了妇女是铁板一块支持禁酒的思维模式,该协会在保利娜·萨宾的带领下,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废除《禁酒修正案》组织。萨宾坚持不与任何政党结盟,只要两党中的任何候选人支持废禁运动,WONPR都将给予大力支持,此举扭转了“干”、“湿”两派在政治上的力量对比,为1933年《第21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1933年支持反禁酒运动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当选美国总统,这标志着禁酒派的大势已去,废除《禁酒修正案》只不过是时日问题了。1933年3月22日,美国国会宣布:所有酒精含量不超过3.5%且不被各州禁止的饮料可以出售。同年,《第21条宪法修正案》通过,《第18条宪法修正案》就此被废止。至此,全国禁酒的“伟大试验”就此结束,全国性的立法禁酒实践成为历史。

二、禁酒运动的特点

第一,禁酒运动初期体现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一时期的戒酒运动的领导者和核心是教会组织。无论是禁酒思想,传播方式,还是戒酒的领导人,都留下了教会的痕迹,宗教的影响贯穿始终。早期的许多戒酒组织都是在教会的支持下建立的,目的是想通过教会参与世俗活动、关注现实社会问题来提高教会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重塑教会的形象。虽然酒在宗教中的应用十分广泛,但很多教会,如浸礼会、卫理公会、贵格会、摩门教等,并不鼓励教徒酗酒和滥用酒类,反对过量饮酒。宗教力量是防止饮酒演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重要保证。到了后期,戒酒主义者想通过立法的形式实施禁酒,经济、政治成为推动禁酒的主要因素,戒酒运动演变成禁酒运动。

第二,美国城市是禁酒运动风暴的中心,农村地区和西部边远地区相对参与不多。从殖民地时期到美国建国初期,大的城镇和东部沿海港口城市一直是北美大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它们既是外来商品和文化的接受地,也是商品和文化向西部输送和渗透的桥梁和中转站。值得关注的是,受欧洲外来文化影响最大的东部沿海大城市的酒文化一直非常发达,因此这里的早期城市居民最先关注和了解到饮酒对社会道德、家庭幸福和饮酒者身体健康构成了威胁,他们最早开始呼吁戒酒,抵制饮酒行为。同时,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尤其是德国、爱尔兰、苏格兰等欧洲国家移民人口的增多,这些城市的外来居民不愿意放弃母国的传统饮酒习惯。因此,这些城市在禁酒问题上态度最复杂,矛盾冲突最大,它们最后成为废除禁酒立法呼声最高、行动最活跃的地方。相对而言,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中等城市人口成分相对单一,内地小城市和村镇的基督教白人居民比较保守,更加注重社会社区的道德环境建设,重视传统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和家庭生活,多数人是忠实的禁酒主义者。纵观美国的禁酒运动史,从呼吁戒酒到法律禁酒,以及后来的废除禁酒立